

李伏伽



曲折的道路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曲折的道路



李 伏 伽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：曹礼尧

封面设计：曹辉禄

插图：万一兵

曲折的道路

李伏伽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印张6.75插页2字数132千
1982年12月第一版 1982年12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2,800册

书号：10118·606

定价：0.56 元

老枝新花迎春开

——序李伏伽同志《曲折的道路》

履 冰

李伏伽同志的短篇小说和散文集《曲折的道路》，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印行，即将和广大读者见面了。这对我省文学事业来说，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。

这里收集的，是作者两个时期的作品。一是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，二是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〇年。这两个短暂的时期，不论对作者或对我们国家和人民来说，都具有不平凡的特殊意义。大家都会清楚记得：一九六一年，那是一个多么伤痛巨深、艰难困苦的年代呵！在政治和经济方面，我们刚刚从三年盲目“大跃进”的迷茫中惊醒过来，对左倾政策所造成的国困民穷的状况开始进行一些调整和匡救，尚未取得显著的好转，人们的思想和生活，象颠簸在急流险滩上的一叶扁舟，处于极大的不安和动荡之中。文艺工作方面，在当时整个形势的牵引影响之下，同样处于很不景气的衰颓状态。“不求艺术有功，但求政治无过”，是当时流行的一句话。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被破坏殆尽。许多作者痛定思

痛，惊悸未消，因而踌躇徘徊，举棋不定。李伏伽同志正是在这一时间，以他担任地区文教局长的公务繁忙之身，以将近花甲之年，毅然奋笔，从事文学写作了。他的第一篇小说《曲折的道路》，写一位长期从事教育事业的中学校长邝自莘，饱览了黑暗中国的腐败与无耻，备尝了世道的险恶和人生的艰辛，背负着沉重的因袭负担，忧喜交集地迎接祖国的黎明，以及如何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辨别方向，坚定信心，心悦诚服地投向了党和新中国的怀抱。用作者的话来说，那就是：“怀着真诚的愿望和激情，想表现一个思想糊涂，对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毫无认识的旧的知识分子，怎么在经过严酷的现实教育后，终于带着血、带着泪投向革命，从而获得新生的。”这样的一篇作品，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，对于广大的知识分子，对于坚定人们的信心，在党中央的领导下，从暂时的危难中把国家引向光明的前途，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，是非常清楚的。作者的写作意愿，是多么难能可贵呵！

《师道》和《双丰收》两篇小说，塑造了章志仁和沈佩文两个中学教师，各以不同的性格、特点和方式，那么忘我地、坚韧不拔地、如醉如痴地忠诚于教育青年一代，在事业的进取中得到锻炼和安慰。这对当时广大的教育工作者以及其他革命干部，同样是一种抚慰和激励。与此同时，作者还写出了《凌云·大佛·苏东坡》、《夏三虫》、《灯》等散文。作者以他渊博的学识，丰富的阅历，热烈的心肠，为我们描绘了祖国明丽的山河，动人的农村生活情趣，感人肺腑的人生图景。在《灯》的结尾，作者情不自禁地大声呼喊：“……我

看见另一种灯。那是伟大的灯、光明的灯。……如果没有这盏灯呵，千万的灯彩都将失色。”在云暗风紧的不平常时刻，作者那颗对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心，不也象一盏暗夜的灯火，闪烁着招引行人的光亮吗？！

然而，对于这样一位作者和这样的作品，当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，大整“走资派”的“四清”运动开始之时，却成了一个大张挞伐的显赫目标，其火力之猛和上纲之高，在全省来说，都是罕见的。这种倒行逆施，指白为黑，鸡蛋里面挑骨头的狂暴行为，我当时虽不可能了解作者是如何椎心忍性以自处，但就我接触的少数文艺界朋友来说，却是无不瞠目结舌、惊诧莫名的了。如果把这一未了的公案比作“秋肃”，那么更可怕的严冬般的“文化大革命”接踵又来了。李伏伽同志自然一开始就是一个“好”对象，又被重新推上狂乱的战场，成为各种武器试练的靶子。我是一个病弱的人，在那风雨如晦的暗夜，每一念及李伏伽同志，我总是担心他是否活着。但出乎意料，当一九七九年春，省里给文艺界几位负责同志和知名人士彻底平反的时候，我欣喜地看到了李伏伽同志。他不仅活着，而且从表面看去，七十一岁高龄的老人，竟然面腴丰润，动作灵活，精神上不见疲惫与老态。这不仅使我高兴，并有说不出的感动：迟暮老人，历经那么多难以忍受的精神与生活的折磨，竟然象一株苍劲的青松，经受了狂风暴雨的袭击，依然峥嵘挺立，这要有何等坚强的毅力与豁达的气度才能如此呵！真可谓岁寒而知松柏的不凋了！谈叙之间，知他身体毕竟大不如从前，脑子也不大好使用了，

但当我劝说他在精力许可的情况下，继续写点作品时，他毫无踌躇沉吟之色，毅然答应“试试看”吧。时过不久，他新创作的第一篇小说《煤》就书写工整地交出来了，并且一发而不可遏，《三见梁彦芬》、《遗书》、《柳暗花明又一村》、《范滂的死》等小说，以及《故乡》、《樱桃红了》、《不废江河万古流》等一系列散文作品，又相继问世了。这种胸怀坦荡，不咎既往，不计个人得失荣辱，为革命胜利驰驱向前的精神，再次体现了李伏伽同志的革命品质。

这一组小说作品中，除《范滂的死》外，也都是以教师生活为题材的。自然，灾难的十年动乱，以及前此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偏颇，不可能不在作者心上留下深刻的烙印。在刻画几个教师各自不同的悲痛遭遇时，作者倾注了深挚的惋惜与同情，对那段失去理性的历史，给以深刻的剖析和清算，但又绝然不同于一些单纯的揭露“伤痕”之作。作者的立意，更多的在于抒写那些忍辱负重者的命运和心灵：他们如何冒着风沙，顶着雨雪，踏着污泥浊水，一步一艰难地跋涉前进；终于跨出了焦涸的荒漠，砭骨的泥潭，迎来了雪化冰融的春天。回首往事，他们问心无愧；瞻望未来，他们壮志满怀。他们锻压成“煤”，可供“四化”燃烧；他们陶冶为“牛”，愿为祖国的丰饶耕耘。夏阳、梁彦芬、邵一平等形象，不都是这样的人吗？《遗书》中的刘志纯，在晨曦洒向他身上的时候，不幸死掉了；但就在他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，仍在牵肠挂肚地呼唤自己被林、江匪帮误了大好年华、驱入迷途的儿子，赶快拨正航向，急起猛追，作一个无负于新时代的人。

对迷途青年的拳拳之情，真可谓“春蚕到死丝方尽”了！

孙犁同志最近在同丁玲同志的通信中，说过这样的话：“我是坚信生活是主宰，作家的品质决定作品的风格的。”我衷心敬服这一说法，并觉得以这样来看待李伏伽同志的作品，也是比较恰切的。李伏伽同志终身从事教育工作，生活经验是丰富深厚的。业余为文，即以教育生活为题材，“写自己最熟悉的东西”。所以展阅他的作品时，在语言、情节、人物等方面，都觉得那么朴实、自如和亲切，如象作者与人促膝谈心一样，娓娓动听，引人神往，毫无生硬、夸饰和矜持之态。他没有惊人的妙语伟论，只是讲着出自真心的恰如其分的话。他不用出奇制胜、故弄玄虚的情节，而是讲一些入情入理、真实可信的事情。他无意用重彩浓墨渲染形貌特异的人物，只是就他所熟知的并根据文意的需要，自自然然地画出人物的言谈、举止和心性，宛如生活中经常见到的人们。我不能明确判断：这究竟是作者的优点呢，抑或是他的缺点？但我承认，我是喜爱这样的作品的。文学创作是需要技巧的。李伏伽同志是有深厚的文学素养的，深知技巧对创作的重要。而一篇作品能写得使人觉得应该如此，毫不显露运用技巧的痕迹，这恐怕正是技巧纯熟之所在吧？正是作者对生活长期静观默察、熟烂于胸的表现吧？我总觉得，“忠诚”二字是这本集子的特色：忠诚于生活的真实，忠诚地描绘生活的图景，忠诚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，忠诚地把自己融汇于作品的血肉之中，向读者敞开自己的心灵。一句话：

“文如其人！”

也许，在题材处理上，不太注意剪裁与洗炼；在人物塑造上，叙述多于描写，是这集子中小说部分的不足之处。但这恐怕是忙里偷闲的业余创作所难免的吧？对此，有识的读者自能鉴别与取舍，我无力作出精当的分析。

承李伏伽同志之命，要我写点意见附在集子里面。从文学修养等各方面说，我都是不够资格，力不胜任的；但却之不恭，只好写点个人的学习体会，谨表祝贺之意。祝贺李伏伽同志壮心不已，老而弥坚，在这文艺春天的大好季节，为我们辛勤培育出更丰盛的精神粮食来！祝贺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业余作者，更勤奋地挥动彩笔，把各人的深切感受，把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新人们的高尚情怀，化为激越的战鼓，诱人的鲜花，使我们新长征的阵容，更加威武雄壮而光彩夺目！而这，也正是我开头所说的“可喜可贺”之意。

1981年8月23日

目 录

老枝新花迎春开·····	履 冰 1
--------------	-------

——序李伏伽同志《曲折的道路》

曲折的道路·····	1
师 道·····	28
双丰收·····	47
煤·····	62
三见梁彦芬·····	85
遗 书·····	106
柳暗花明又一村·····	126
范滂的死·····	139

凌云·大佛·苏东坡·····	160
夏三虫·····	165
灯·····	169
油 菜·····	173
樱桃红了·····	177
故 乡·····	184
小 咪·····	191
不废江河万古流·····	198

后 记

——我怎么搞起创作来的？·····	202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曲折的道路

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中旬，当解放大军正向川西平原疾进的时候，这座坐落在川西南的万山丛中的小县城，也在地下党领导下解放了。这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，因为伪县长早在一月前就已离县，地方当权派的参议长赵丹梧和副议长严弼臣，在急转直下的时局前面，象没头苍蝇一样，昏头转向，一看情势不妙，也逃走了。因此，只于宣布解放的当天，接收了伪县政府。这其实只剩了一个空架子，一些重要一点的僚属，都已悄悄作鸟兽散。一个县警察中队只剩下十几个烟鬼和几十支破破烂烂的长短枪枝。但是，就是这么一个烂衙门，也搜出了上百斤的烟土，十几套鸦片烟具，若干副竹制、胶制的麻雀牌。这些东西连同武器、镣铐、铁链和沾有斑斑血迹的夹棍板子等刑具，都被带到了正在开大会的公共体育场的主席台上。同时来的还有几十个刚从大监里释放的囚犯，他们大都是些老好的乡下人，却莫名其妙地被关在监里多年，现在变得骨瘦如柴，一身破烂，头发足足有三、四寸

长。由于长久不见天光，他们显然很不习惯于这呆呆的白日和广大的场面。他们惊疑、迷惑、哆嗦着，后退着，还一时不能理解人们告诉他们的的新鲜事情。这些，立刻在群众中引起了莫大的骚动。人头攒动，人们都想挤到主席台前看个明白。惊奇、慨叹、全场嗡嗡然。这些可怜的人们与奇怪的展览品的出现，也给正在讲话中的中学校长邝自莘以很大的激动。他提高声音，象嘶喊似的，想倾吐出他狂欢与愤怒的心情，但不中用，嗡嗡的人声象大海潮鸣，将他的声浪完全淹没。

邝自莘今年四十八岁，本地人，但过去却长年在外。他在青年时期在外面住大学时，由于受了“五四”新思潮的影响，曾经热烈地崇拜过民主、科学，写过攻击封建道德礼教的文章，也曾公开反对家庭的包办婚姻，以致从此和家庭绝裂。大革命时期，他积极地参加了一些反帝反军阀运动。他英气勃勃，觉得生活很充实，对中国社会的前途也充满了信心。但不久，大革命失败了，白色恐怖弥漫全川，他看见一些相熟的朋友、学生暴尸街头，或者被捕以后，从此便没有下落。他自己也被捕关了三月。出狱以后，便失了业。个人生活的苦恼和对现实的失望与厌恶，使他一下子对一切丧失了信心，变得十分消沉。这以后，虽然仍在一些中、小城市里转来转去地教书，但已绝口不谈政治，除教书外，绝不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了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全国蓬蓬勃勃的抗战救亡的局面，又才使他振作起来。他以为中国之所以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世道人心太坏，而教育

是百年树人的大计，要救亡图存，复兴中国，还应有一些“傻子”埋头苦干，踏踏实实做一些奠基的工作。由于对教育有了这样的认识，因此他下定决心，今后终身从事于这个工作。他想：只要锲而不舍，生死以之，一定可以做出一点成绩来。而恰在这时，故乡筹办中学，要他回去作校长，他也就欣然回来了。

学校名义上虽然是县立中学，但经费来源却不靠所谓县预算，而是开办的时候，由地方决定在牛羊税上附加一点“乐捐”，每成交羊子一头，抽银二钱，牛一头，抽银一两。由于这些年来这山区的大烟买卖特别发达，赶牛羊进山掉换鸦片的特别多，于是牛羊市场也就十分兴旺。人们说谁收牛羊税，谁就跌进了银窝窝。参议长赵包包是精明的，一开始就看中了这点入息，他第一步是支使人以包商名义，承包“乐捐”的收入；第二步是成立一个“经费管理委员会”，自任主任委员，把全部收入揽在他的手里。这样，学校的一切开支，都得伸手向他乞讨。管会计的小陆在参议会的牌桌上找着他，怯生生地说：

“赵议长。”

“做啥？”

“今天赶场，要领点钱买米。”

“唉？”议长宛然吃惊了，“初九那天才给你们五斗米呀！”

小陆陪笑说：“议长你算算哇，都三场了，学校十几个人，一天要好几升米，还有菜钱……教师们还要用点薪

水。”

“牛羊税人家不缴嘛，我有啥子法？”

小陆再说，他就发怒了：“老子我不会偷人抢人，又没有开银行！——九筒，碰起！”

这以后，他就专心打牌，再也不理小陆的了。小陆是本校毕业生，年青面皮薄，第一次去，就哭着回来了。

就这样，十年来，他们都过着乞讨的、屈辱的日子。外来的教师受不了这种半饱半饿的生活，不到一年半载，就闹着辞职走了。邝自莘也激动了好多次，赌咒把这期一过，再也不干了。但是，他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哲学——一种糊涂的杂碎，象孔子的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呀，释迦牟尼的“我不入地狱，谁复入地狱”呀，等等。他宛然是以一种“悲天悯人”的姿态，想在这遍地烟匪袍哥的山国里，保持一片干净土。他幻想要使学校成为一盏明灯，照亮一些在暗中摸索的青年。因此，当其冲动一过，他又心安理得地留下来了，而且还热心地鼓励着、劝勉着他的同事，把自己的幻想去影响他们，要他们和他一道为这个事业奋斗。教导主任钟日晖就是被他这样苦苦留下来的。钟日晖虽然不相信他这一套，以为这不过是一种幻想，在人家胯下过日子呢，连一碗饭也要向人乞讨，能做得出什么事来？而且校门以外，就是那罪恶的海洋，学生回家去，还得藉童子军服的掩护，帮助家里偷运鸦片，你这个教育又起什么作用？但这是一个年青人，容易受热情的感动；而且回头一想，自己不过是一个师范毕业生，别无人事依托，回到家乡去，也没有什么更好的事可

做，也就无可奈何地留下来了。

但这半年来，钟日晖却很不安心于日常工作。原来从暑假后，陆陆续续从成都回来了一些青年，他们大都是本校毕业，在外面住高中、师范或大学的。这些人这回回来似乎带有一种特别味道。他们经常在一起，爱说“交换意见”，“研究问题”，还带回来些新书互相传阅，而最特异的是唱一些新歌：“布谷声声”，“山上的荒地是什么人来开，地里的鲜花是什么人来栽……”歌声嘹亮、奔放，有一种力激动着和吸引着人们。还有秧歌舞《朱大嫂送鸡蛋》，也很别致、新鲜。钟日晖完全被吸引着了。他整下午弹风琴、学唱歌，组织学生练集体舞。而邝自莘呢，看着学生们那样生气勃勃地跳着、唱着，也很感动。他听着沉郁的、愤怒的“跌倒算什么，我们骨头硬”，他的腰肢也一挺；听到欢乐的“山那边呀，好地方……”他也似乎有所憧憬，有所追求。但憧憬、追求的是什么呢，却是模模糊糊的。

一天，一个常来学校的叫吴传禄的学生又来找他。这是一个个子高长、黑瘦，却相当沉着精干的青年。他是本校第一班毕业生，也是在成都住大学，本期中途才回来的。他拿着一卷报纸，兴冲冲地和他谈论时事。忽然，他停了一停，望着邝自莘，然后很关心地问道：

“校长，时局一天一天的严重了，你们打算怎样呢？”

“我们？”邝自莘一怔，因为他从来没有想到他要做什么，于是坦然一笑说：“我还不是关起门教我的书！”

“这以后怕更困难，更不好办了吧？”于是，他细心地

为他分析当前形势：现在时局急转直下，解放大军正以疾风扫落叶之势，解放涪陵，逼进重庆，整个国民党政权象一所倒塌中的破房子，正在土崩瓦解。但是，黎明前还有一段黑暗的时光。宋希廉残部正在向这个山区退却，国民党特务还妄想在这一带建立游击根据地，负隅顽抗。现在为了堵截溃军，迎接解放，安定地方，地方上进步的人士应当赶快行动起来。他说邝校长在县里办学多年，在青年中有很高的声望，如果能参加到这里面来，一定会发生很大的作用。最后，他率直地告诉他：外边有人到县里来联系，如果邝校长愿意，他可以介绍他们见面。

邝自莘听着这个青年低沉的但是急促的谈话，看着他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炯炯发光的眼睛，他感到有些心跳。一直到吴传禄说完了，他觉得他的闪闪的目光正射着他，在等待他的答复，他才嗫嚅地说：

“这个，我不行呵！我一贯教书，从不过问政治。”

“校长，这怕不行吧。你不过问政治，政治却要过问你呵！譬如，如果我们都不管，将来大乱起来，学校能超然于外吗？”

“乱，也只是一个暂时，不管什么时代，教育总还是要的。”

“当然学校是要办的，但要看给谁办，怎样办。”

邝自莘一时没有理解到这话的意思，他疑问地望着这个象竹竿一样高瘦的青年。他也没有作进一步解释。但忽然，吴传禄闪着忽悠悠的眼光，热烈地说：

“校长，我们是了解你的，你的抱负，我们是崇敬的。校长平时苦口婆心教育我们要改造社会，怎么到了今天，当真正有机会改造社会的时候，却反倒不参加呢？”

这一问，却使邝自莘回答不上来，因为他平时主张的改造社会，振兴国家，转移风俗，改换人心，是空洞的，是孔孟思想、宗教思想揉合而成的一些抽象的道德教条。他教学生不要贩烟、赌钱、讲袍哥、作坏事，要作一个堂堂正正的人。但这个人到底该作些什么事，要怎样才能改造社会，振兴国家，他却又说不出。他也会想到革命，但革命便是从事政治活动，便是阶级斗争。而教育，他认为应当是超然的。

显然这个精干的青年人也猜透他的心思，他更加热情地说：

“校长，现在形势已很明白了，黑暗的中国已面临黎明。我们多年向往的新中国不是快要实现了吗？国民党反动黑暗的统治不是就要彻底垮台了吗？不要说远了，就在我们县里，如果能够把赵丹梧、严弼臣和那些大爷二爷、三哥二哥除掉，不也就大快人心了吗？”

这一席话，果然使邝自莘振奋起来了。自来，他对这个社会的确不满，也迫切地希望来一个变化。但在平日，那只是感情上的发牢骚，在思想上他却是不大相信的。对于政治上的事情，他有一种悲观的想法，以为中国的事情太糟糕了，国民党自然搞不好，共产党来也未必搞得更好。他一向连时事都不大关心，以为反正不过是那么一回事。然而，突然，这